

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

叶 澜 主编

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

GUANHUAI SHENGMING:DANGDAI ZHONGGUO XUEXIAO JIAOYU JIAZHI QUXIANG TAN

李家成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世纪末中国书画作品拍卖会

叶一苇书画

叶一苇书画作品集

叶一苇书画作品集

叶一苇书画作品集

叶一苇书画作品集

叶一苇书画作品集

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

叶 澜 主编

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

GUANHUAISHENGMING:DANGDAIZHONGGUOXUEXIAOJIAOYUJIAZHIQUXIANGTAN

李家成 著

责任编辑 罗永华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 李家成著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1
(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叶澜主编)
ISBN 7 - 5041 - 3068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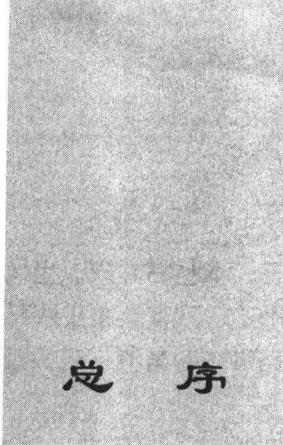
I . 关... II . 李... III . 基础教育 - 教学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 G63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061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36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17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254 千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 80 元 印 数 1 - 5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叶 澜

还能清晰地记起迎接新世纪曙光时的一份欣喜和期望，如今，新世纪却已跨入了第六个年头。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在探索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之路上没有停步。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这支“改革小分队”五年研究的成果结集，也是“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①的延续和超越。

“延续”，集中体现在前后相继的两套丛书在研究主题上的相关性。这不但可以从丛书总称中看出，也表现在两套丛书中部分书名的呼应上。如《“新基础教育”研究史》（本）与《“新基础教育”论》（前）；《学校转型性变革的方法论》（本）与《学校教育研究方法》（前）；《学校转型中的教师发展》（本）与《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前）；《青少年发展研究与学校文化生态建设》（本）与《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前）；《中国基础教育评价的积弊与更新》（本）和《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前）等。这种延续本身就反映了基础教育改革的丰富性和艰巨性。

“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本丛书的主题更集中到中国基础教育的学校转型性变革上。这是研究范围的集聚和对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趋势与性质认识上深化的表现。其二，在学校变革的研究范围上，增加了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以表演的视角解读教育活动，以教育社会学的立场研究理念的力量，以及学校转型中的管理变革、教学改革、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反思与重构等选题，使本套丛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

^① 该丛书共有著作7本，已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下总序中涉及该丛书中的书名加（前），涉及到本次出版丛书的书名加（本），以示区别和便于比较。

更为丰富和相对完整。其三，本丛书力求以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与国际教育改革趋势为共同背景，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意义上阐述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深度上体现对前一套丛书的超越。

本丛书的形成从主题到内容，都与本人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的深化直接相关，该丛书的作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新基础教育”研究，可以说，“新基础教育”研究过程滋养了这套丛书。但是，丛书写作和思想的资源并不局限于“新基础教育”。我们的目的是对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更为普遍和基础性的研究，同时也反映我们在改革研究中形成的理论、经验和思考，以此和大家共享，并期望引起更多人的探索与研究。

感谢教育科学出版社对我们两套丛书出版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十年探究的收获有了呈现和存留的平台。感谢所有为这两套丛书出版作出各种支持的各位朋友，你们的努力为丛书增色不少。

期待着各位读者的指点和帮助。

目 录

导 论 / 1

- 一、背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 1
- 二、问题：学校教育价值取向 / 19
- 三、定位：研究主题、结构与价值追求 / 23

第1章 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研究的反思 / 39

- 一、分离性研究类型 / 39
- 二、对立中寻求统一的研究类型 / 58
- 三、重建式研究类型 / 65
- 四、反思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研究 / 72

第2章 学校教育价值生命取向的反思 / 77

- 一、学校教育内容层面的生命取向 / 78
- 二、学校教育目标与学校教育特殊领域的生命取向 / 82
- 三、整体性深层次的学校教育生命取向 / 93
- 四、反思学校教育价值的生命取向研究 / 99

第3章 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改革实践的反思 / 103

- 一、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改革的基本特征 / 103
- 二、当代中国学校教育实践的深层问题 / 115
- 三、时代呼唤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转型 / 120

第4章 教育立场下的生命 / 131

- 一、概念的辨析 / 131
- 二、生命的向生本性 / 146
- 三、生命的意义追求 / 156
- 四、生命在自组织的活动中获得自我更新 / 169

第5章 生命视域中的学校教育 / 183

- 一、学校教育介入人的生命之中 / 184
- 二、学校教育是丰富的学校教育生活 / 187
- 三、学校教育是制度保障下的生活 / 208

第6章 重建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 / 223

- 一、认识学校教育的当代价值 / 223
- 二、重建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 / 228
- 三、重建学校教育目标系统 / 236
- 四、“新基础教育”改革实践的启示 / 246

主要参考文献 / 255

后记 / 263

导 论

生活在当代中国大地上的我们，都能感受到社会转型节奏的加快、力度的加大、广度的扩展。处于这一情境下的学校教育，必须直面社会转型，通过自我更新，实现学校教育自身的转型。

在这一系统工程中，重建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而且，从当代中国教育理论研究深化与拓展的需要来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那么，这一主题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如何明确研究主题？如何建立研究的结构？研究追求何种价值？这都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一、背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论述，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社会转型作为学校变革背景的研究，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思考。

（一）透视“社会转型”的视角

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里，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抓住社会转型中的突出部分，进而集中论述它与学校教育

的关系，例如对信息技术教育的关注、对外语教育的重视等。这类研究具有凸显某些社会转型特征的价值，但也容易忽略整体。

另一种研究方式，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待社会转型。例如，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中国学校教育改革的走向，这为中国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再如，从知识经济的角度论述社会转型。这类研究指出，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在中国，知识经济初露端倪，这将是不同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转型，对教育的整体变革提出了挑战，提供了机遇与可能。

这两类研究都是有价值的。本研究的对象与目标，虽然与宏观大背景及新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但我们不能简单挪用上述思维框架。因为，凸显新异点的研究方式，明显不适合本项研究。而已有的整体性社会转型研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变化或社会外部形态（全球化）的变化进行思考。而本研究关注的是：真实地生活在这一转型期的人，面临着何种挑战？学校教育需要培养何种形态的人？为了实现目标，学校教育如何设计自己的存在形态？这是一种以学校内部变革为主题的背景研究，需要重新分析新的社会发展因素对社会整体的改造，看到相互间的关系，而不能截断联系、截然区分。

我们对社会转型的研究，集中在对社会的组织形态与运作方式的关注上。社会的组织形态是指作为个体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形态的静态式凝聚；社会的运作方式，是这一关系形态的动态性展开。社会，如同一个生命体一般，也有着自身的构成与运行方式。从这个角度考察“社会”，就是考察社会的整体面貌呈现、内部运作的基本机制。个人与社会具有无法割裂的关系，而这正是教育价值取向研究价值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有种观点认为，社会是人的集合体，这一观点揭示的是“社会”的状态。需要追问的是：“社会”存在的价值和需要“社会”的理由。人类最初何以集合成社会？究其功能，最为原始的就是满足个人生命维系所必需，但在强大的自然界中，个人力量又不能得到安全、食物等生存需要。此后，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这一基本的功能与动力并不会改变，只不过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在丰富、拓展、提升、深化。不同生存环境之下的人，为了生命的生存与发展，都会创造出不同的技术、思想与社会。不

不同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的组织方式，有着不同的运作方式，而处于不同社会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中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生存方式。

就中国而言，在社会组织形态上，历史上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空间”性。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有一个很顽固的空间观念，就是‘天下’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外延扩张的方形，而文明等级就由这种空间位置所决定，越在中心文明等级越高，反之则逐渐降低，先秦的五服之说就是这种空间的位置观念与文明的价值观念的表现。”^① 而在这一文明系统的内部，同样有着“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先于四方”^② 的思想观念。以此构建起的社会组织形态，就是一个中心统辖边缘、层层疏远的社会格局。这一社会组织形态的合理性在于：有利于保持稳定状态，保障群体生命的存在与逐步优化。在极具创造力的文明形态形成时期，无论从思想还是从生活实践看，中华文明都是富有生气的。但是，这一时期也正是大乱的战国时期，“社会秩序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个更现实的话题换个说法就是：究竟如何才能使这普遍混乱的社会从无序到有序？”^③ 这一时期生成的各种社会思想，都是面对社会生活现实而作的思考。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深藏着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他的‘复礼’的思想核心，他的哲学‘理路’乃是在‘人间’恢复‘秩序’、‘和谐’，并提出包括‘仁’在内的哲学理论来支持他的‘和谐’、‘秩序’论，这符合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在某些革命的非常时期外，孔子总是占据了中国的精神上的至尊地位。”^④

从运作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系统的运作是借助于少数人的设计、指挥、调整而实现的。在古代中国，儒家所追求的是“把这种‘自由’集中在‘圣王’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而将其他人（‘他人’）都当成‘服从’这个‘自由’（意志）的‘工具’和‘臣民’（奴隶）”^⑤。并非“圣王”的“我们”，需要寻找自己的位置，自觉地纳入到这一关系结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43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② 同①，19页。

^③ 同①，158页。

^④ 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19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⑤ 同④，52页。

构之中，“‘位’、‘定位’和儒家的‘仁’、‘中庸’等等，密不可分。在儒家看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都找到了‘自己’各自的‘位置’，而各‘安’其位，则‘天下’就会‘太平’——各各相安无事”^①。于是，平常百姓就不需要、也不可能过多地思考国家大事，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生活、思考；少数精英就可以通过礼与法两种调节手段，对社会运行进行控制。尽管其中有对立、对抗甚至激烈的冲突，但这一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发生根本性转换。而且，在没有巨大的外来冲击状态下，在比较自得的文明自豪感的情绪感染下，这一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保持了很长时间。“一切相互关系、一切组织在自我维持的同时都会锁住（固定的、静态的系统）或动员（动态的系统）联系的能量，以补偿或平衡对立和分裂的力量，克服离散的趋势”^②。这样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与运行方式，维护了社会系统的稳定，保障了个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但也封锁了进一步发展的通道。

这样一种“社会”，既意味着一种复杂系统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人”的存在方式。但随着鸦片战争而“天崩地裂”了的中国思想界、被完全抛入“混沌”状态的中国社会生活，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已经很明显地进入到全球化的现实环境之中。因此，今日的我们需要在“全球化”这一新的“生存环境”中，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亦即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环境

从复杂系统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已经从相对封闭的状态转换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状态，全球化形成、强化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带来了当代中国（包括中国学校教育）新的生存环境。直面这一新的环境，我们既要看到它带来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它带来的可能。这样，我们可以从纵向的空间格局的变迁和横向的系统复杂度的增强这两个维度看待当代中国及中国人的现实处境。

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与运行方式在新的语境下，遭遇到生态环境

① 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26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② [法]莫兰著，阎素伟译：《社会学思考》，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的巨大变迁。

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开放的国门、日益深化的改革，形成中国社会新的存在环境。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封建大国，即使有通商、战争的存在，但在心理上，“中国”的中心性，一直是稳定的。这种封闭不是就地理性而言，而是从心理上、从一个稳定系统的角度而言的。“中国人”生存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即一个稳定的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农耕社会的环境下。在这一具体的环境下，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是合理的。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国，生存环境出现了真实的变化。在空间上，中国由“中心之国”转为边缘、成为“远东”；在地位上，中国从强者转为弱者、病夫；在心理上，中国从稳定、自足、安宁的状态转为被欺辱、被宰割的状态。原有的“世界图景”就在真实的“眼”中幻灭。而现在的真实，是“全球化”，是中国在新的环境之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改革开放前后，又有着重要的不同。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洞开的国门背后，更多的是防御、抵制、自救；改革开放之后，则更多的是主动地争取、学习。申办奥运会、世博会，加入WTO，可以说是这种“主动”的明显体现。有学者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它不是一种出于使原有社会体制和文明形态自我完善并取得合理性的“主动的现代化”，而是出于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历史紧迫性的“被迫的现代化”。结果，形成了一种颇具复杂情绪的中国现代化心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不是对新东西的渴望，而是对失去旧有物的恐惧，于是，保种、保教、保国、保民成了现代化的核心。”^①而“市场经济的建构正在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上述社会文化结构。一方面，今天社会意识形态的聚焦点不再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它给哲学理论研究和大众生活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经济利益、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式、多元的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与禁止，而是被默许、宽容，甚至被鼓励。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立根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社会活动主

^① 衣俊卿：《文化哲学》，21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体开始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活动方式，通过接受现代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而自在自发走向自由自觉”^①。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已有研究成果，只是想说明：对这种生存环境的意识，已经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我们将全球化视为新的生存环境，自然要关注我们自身的现状与历史，自然要思考我们的生存能力，自然要思考我们的发展空间，自然要集中到对自身的生存方式及文化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更新之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就不再仅仅是防御性的，而是面对新的世界，以主动的应对、积极的建设为特征，整体性面向未来，思考自身的前途。

总而言之，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环境，并同时成为我们社会转型研究、文化研究的新语境。我们需要在新的生存环境下，争取文明的生存权、发展权，争取文化的发展空间、提升发展层次，争取当代中国人更好的生存前景。而学校教育的更新，正是这一整体性更新的有机构成。这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来进行分析的。

从另一维度看，空间的扩展，也就意味着“复杂度”的提高，即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程度、系统内外的相互作用程度提高，带来系统自我演化之可能性的增加。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自身文化的开放。“全球化不是一幅静态的世界图景，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全球化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同化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与此同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②。国门的开放，使得异样的生存方式展现在国人的面前。“不同”所带来的震撼、诱惑、刺激，是文化自我意识得以产生的条件。而且，这一开放，伴随着国内改革中所展现的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强化了社会的“热”的状态。在差异中，我们更容易思考：我自己是怎样的？我应该、可以怎样？开放，为巨大、稳定的系统的更新带来了可能。

① 衣俊卿：《文化哲学》，23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② 彭新武：《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3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其次我们关注的是开放所带来的互动。在不同的生存方式之中，生存于其中的国人，很难再安稳地生活，自己原有的稳定的“世界”已经消逝，代之而来的的是一个变动的环境。在这里，无论是对域外文化的抵制、排斥，还是对异种文化的追逐、模仿，都是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体现。这里，有混乱、躁动，有偶然、意外，但“互动”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全球化一词，其最为普通和最无争议的含义（如我在本章中的理解），是指一种发展过程，指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某种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用的时间——有形或想象的——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把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① 在这种时空的压缩中，互动的可能性极大地增长。

最后我们关注的是互动所带来的生成，包括新的自我的生成与新的生存环境的生成。“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时髦的词，它还包含着使我们人类既有可能发展，也有可能退化的普遍复杂性和矛盾。”^② 但也正是在充满混乱、新奇的互动之中，更高层面的新质有可能脱颖而出。互动的自然状态，就是诸多可能性的出现。而在其中，有的可能性会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从而“锁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在历史的发展中，文化的新生，往往是在充满热能的“互动”中实现。尽管，这可能会带来灭亡，但灭亡的危险与新生的希望是相伴相生的。文化新质的涌现、文化质量的提升，正是在直面危机中实现，并在新的层面上面对更加巨大的挑战。

以这种复杂系统自组织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今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校教育，它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紧迫的使命感，而且有新生的可能——尽管这种新生是有危险的、不确定的。

^① 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见吴士余主编：《视点 大众文化研究》，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② 彭新武：《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3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面貌呈现

1. 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个体生存方式的变革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聚焦当代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在公共生活领域，当代中国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发生了并仍将持续发生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带来了个人与世界之间新的关系形态。

在经济生活中，我国已经确立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等为 21 世纪头 20 年经济建设与改革的主要任务。与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这一改革，将带来当代中国经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每个生存于其中的个体，都将面对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基本的生产途径是农业生产、自足自给不发达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状态下，对“天”、“地”、“群”的依赖，造就了群体生命价值观，封建宗法制度与此生命价值观构成一个自我强化系统，从而维持着中国的稳定状态。从经济生活形态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与农业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在改革开放前，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却并未发生层次性的质量提升。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大国，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不平衡，整体经济结构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这是与当时国内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

改革开放之后，从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的确立，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与发展目标的确定，经济生活发生着整体变革。当代中国在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始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传统的经济活动获得新的科技、资源、管理、运作方式的改造。这一点，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并将变得更加迫切。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的力度、自觉性进一步增强。当代经济生活的改革走向，越来越需要并体现出对市场机制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创造力的尊重、对主体意识的尊重。传统产业结构的改造更新、新产业的兴起，越来越突出技术创新、制

度创新、理论创新的价值。在与国外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也越来越强调从模仿、追踪到自我创新的转换。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及生活方式，都无法应对这一变革。新时代的经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呼唤并同时塑造着新型的当代中国人。

这样，经济生活的变革至少带来了人的生存方式的以下变化。

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新型的经济生活，不仅需要个体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积极主动的意向，而且需要个体在积极主动的互动中，体现良好的道德素养与法律意识，体现出合作的意识与共同学习的精神。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需要一种新的规则加以调节。

在个人与单位关系上，“单位制”正在解体，个体对单位的“依附”将越来越不可能；单位对个体的人身限制与计划体制减少，因而，个体需要、必须、可能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不断转换的岗位、不断提高要求的工作中，并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责任与失败的风险、必要的代价。它所呼唤与养育的将是一个自立自强、自我负责的个体。这种个体对“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的摆脱，在经济生活中首先获得突破，并在政治生活等领域进一步扩展。同时，对于经济领域的企业而言，也需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与结构方式，建立一种吸纳人才、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创造力、争取市场、壮大企业的新的企业与个体的关系形态。

在个人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解放了个体的活力，为个体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个体在市场经济中，不能也不必再是一个俯首听命、等待安排的被动的人，而应该、需要、可以是一个积极投入市场竞争，积极获取、选择与利用有效信息指导自身行为，从而不断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个体。

在个人的自我意识维度上，市场经济需要一种自立自强，具有独立意识与合作精神，具有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具有创新与承担责任的勇气的个体。他信任自己的生命力量，不断开发自己的内在可能，积极进取，勇于实践，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实现自身生命价值。今天的现实真实地赋予了个体把握自己命运与幸福的可能。

综合上述各种关系，在人与事的关系上，当代经济生活需要的是在清晰的意识与自我意识指导下，合理地规划自身的发展目标，积极主动地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重建的新型个体。人与事的关系，不再仅